

## ※文哲譯粹※

# 汪孟慈所謂《海外墨緣》的抄本與金阮堂

藤塚 鄰\* 著 川路祥代\*\* 譯 楊晉龍\*\*\* 校訂

汪喜孫者，清代揚州甘泉人，係以絕世之才、睥睨之態，卓然自立於乾嘉學術界的碩儒汪中之子<sup>1</sup>。喜孫，字孟慈，後以避九世祖諱，易名為喜荀。乾隆五十一年(1786)七月十六日生<sup>2</sup>。九歲喪父，哀毀如成人，既長，銳志讀其父書。師事魏彝群、丁瀚、韋佩金、鍾懷等人；受知於伊秉綬、張敦仁、江藩等；樂與父執諸老王念孫、劉台拱、朱彬、段玉裁、孫星衍、阮元等遊，故得多聞先人之緒言。先人之遺墨殘箋，雖片紙隻字，必寶而藏之，又彙而錄之。復博求名公鉅卿之銘詠，以表揚其先德之美。學愈進而識愈高，父執諸老咸歎賞云：「幸哉！有子！」為容甫慶也。嘉慶十二年(1807)，揚州守伊秉綬，拔為鄉試第一，特贈「樸學尊記注，清詩緣性情」楹帖。次(十三)年入京，在都數年，屢應禮部試而不中。十九年(1814)，賴鮑勳茂之助，入貲為內閣中書，升戶部員外郎。其後，歷任山東司員外郎、湖廣司員外郎、欽差東河學習、懷慶府知府等職，在職期間勵精從事，大有治績，人民擁戴稱頌，甚著循聲。道光二十七年(1847)八月三日，以積勞殉職，享年六十有二。喜孫為人，嚴正剛直，疾惡如仇，為官亦廉且敏。其所交往，皆為當世

\* 藤塚 鄰，京城（漢城）帝國大學教授。

\*\* 川路祥代，南台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 楊晉龍，本所副研究員。

晉龍按：〔日本〕藤塚 鄰著：〈汪孟慈の所謂海外墨縁の草本と金阮堂〉一文，原刊《漢學會雜誌》第3卷第2號（昭和10年〔1935〕10月），頁37-64。此文係整理點校《汪喜孫著作集》的成果之一。原文先委由川路祥代先生初步翻譯，筆者再進行文義確認與文字潤飾的工作。在確認文義翻譯的過程中，渥蒙本所林慶彰先生及廖肇亨先生的大力協助，謹此致謝。

<sup>1</sup> 原註：汪中「字容甫」。

<sup>2</sup> 原註：乾隆五十一年「丙午」。

所重之名賢碩學；其學根柢禮經，融會漢、宋，力除門戶之見，廣川之大業、高密之傳經、洛閩之道學等，皆其所尊崇，要以通經致用為歸。編著有《國朝名臣言行錄》、《經師言行錄》、《尚友記》、《從政錄》、《孤兒編》、《且住庵詩文稟》、《汪氏學行記》等。

汪喜孫之學行，除自著之《孤兒編》、《從政錄》、《年譜》外，亦詳於其子汪保和等所撰〈汪孟慈行述〉、其友劉文淇撰〈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sup>3</sup>、及汪翼鳳撰〈河南懷慶府知府汪公墓表〉<sup>4</sup>等所言。另外，在汪喜孫的生命歷程中，有些具有重大意義且不可忽略的事件，前述諸文卻全然未提及，那就是他在清、鮮文化交流上所扮演的角色。李朝貢使學人的交流範圍，本以直隸、山東、江浙、廣東等學派的學者為主，但較令人感興趣者，則是與以阮元為核心的揚州學派學者間之學術交往，這纔是最值得注意的事，汪喜孫則正是其中之一。汪喜孫在京多次為官，有機會與許多李朝貢使學人相識，又透過他們的關係而認識更多的人。其知友有金魯敬<sup>5</sup>、金正喜<sup>6</sup>、金命喜<sup>7</sup>、權敦仁<sup>8</sup>、申在植<sup>9</sup>、洪敬謨<sup>10</sup>、李尚迪<sup>11</sup>、金善臣等<sup>12</sup>，共有十數名。其中與汪喜孫交往最相契合者，就是從未謀面過的金正喜<sup>13</sup>。探討汪、金兩者的學術交流，不僅具有價值且有意義，因從汪喜孫寄給金正喜信件的手稿及抄本<sup>14</sup>，即可大致瞭解嘉、道年間經學界的實況，同時也可看出金正喜等李朝學者，透過與汪喜孫交往的學術刺激，欲為沉寂已久的李朝學界，開創新的學風。

<sup>3</sup> 原註：「代阮元作」；文見「《青溪舊屋文集》卷九」。

<sup>4</sup> 原註：「《聲遠堂文鈔》卷三」。

<sup>5</sup> 原註：金魯敬「嘉慶十四年〔1809〕十月冬至副使；道光二年〔1822〕十月冬至正使，兩至北京」。

<sup>6</sup> 原註：金正喜「魯敬長子。嘉慶年間，隨父至北京」。

<sup>7</sup> 原註：金命喜「魯敬次子。道光年間，隨父至北京」。

<sup>8</sup> 原註：權敦仁「詳後」。

<sup>9</sup> 原註：申在植「道光六年〔1826〕十月冬至副使；道光十六年〔1836〕冬至正使，兩至北京」。

<sup>10</sup> 原註：洪敬謨「道光十年〔1830〕十月冬至副使；道光十四年〔1834〕二月進賀正使，兩至北京」。

<sup>11</sup> 原註：李尚迪「隨行貢使，前後十二次至北京」。

<sup>12</sup> 原註：金善臣「道光二年〔1822〕，隨金魯敬至北京」。

<sup>13</sup> 原註：金正喜「字元春，號秋史，又號阮堂」。

<sup>14</sup> 原註：汪喜孫寄給金正喜信件的手稿及抄本「家藏共有十數封」。

的企圖。相關的內容，目前尚無法完全詳述，在此僅擬介紹汪喜孫《海外墨緣》及其《抄本》，兩本在文字上的異同；以及《抄本》作者對清朝文化理解的淵博與敏銳的批評。

金正喜最信任的親友，就是權敦仁。敦仁，字景羲，號彙齋，安東人，權尚夏五世孫<sup>15</sup>。純祖十三年(1813)文科及第<sup>16</sup>，憲宗八年(1842)入朝為相<sup>17</sup>，官至領議政，以事謫連山而卒。敦仁，深於經、長於詩，能書，嗜金石刻印。日與正喜談說論道，意氣相投，交情始終不渝，今從金正喜寄給權敦仁的數十封信札，即可看出兩者交往的密切。

權敦仁，純祖十九年(1819)，即嘉慶二十四年十月，以書狀官身分，隨從冬至正使洪羲臣、副使李鶴秀，抵達北京。憲宗二年(1836)，即道光十六年二月，以進賀兼謝恩正使，偕同副使安光直、書狀官宋應龍等，再次到北京。權敦仁第二次出使北京，臨行之際，金正喜嘗贈其餞別詩一首云：

### 送彙齋尚書赴燕

皇華二月擁仙曹 暫攝西樞碧落高  
 縱使百迴猶不厭 如今重到詎云勞  
 誰於積水觀澄鏡 正及豐臺試紫袍  
 朱老阮生應問我 頽唐半世雪盈毛

詩中的朱老、阮生，應當是指舊識朱鶴年、阮元之次子阮福<sup>18</sup>。金正喜不僅將權敦仁介紹給他們，還介紹給當時正在京師，且一向交往密切的汪喜孫。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四日，汪喜孫與葉紹本、黃爵滋、黃琮、徐寶善、陳慶鏞等，同邀劉寶楠等四十二位賓客，於江亭行脩禊之儀<sup>19</sup>，一時稱為盛會，汪、權之交，從此開始。同年(道光十六年)六月，權敦仁東歸；其明年，即道光十八年(1838)八月二十日<sup>20</sup>，權敦仁寄給汪喜孫一封多達數千言的長信，該信當是委託李義準等冬至使節團而送達。道光十八年，汪喜孫為其友陳慶鏞〈問經圖〉作〈跋〉<sup>21</sup>，文中曾針

<sup>15</sup> 原註：權尚夏「宋時烈門人，諡文純公」。

<sup>16</sup> 原註：純祖十三年「嘉慶十八年」。

<sup>17</sup> 原註：憲宗八年「道光二十二年」。

<sup>18</sup> 原註：「(阮)福之兄常生，道光十三年卒」。

<sup>19</sup> 原註：江亭「原名陶然亭。康熙乙亥，江藻所建，因稱為江亭，又稱江翁亭，在龍樹寺旁」。

<sup>20</sup> 原註：道光十八年「戊戌」。

<sup>21</sup> 原註：陳慶鏞「與金正喜為神交」；〈問經圖〉「陳(慶鏞)向阮元問經之圖」。

對阮元之學，鉤玄提要，頗能擷其精華。同年十月十五日<sup>22</sup>，寄給儀徵劉文淇的一封信，論古文《尚書》之語，極為平允，並提出學者當以經明行修、通經致用為目的之觀點<sup>23</sup>。此時又正好接到權敦仁的來信，汪喜孫再三誦讀，感歎不已，遂裝訂成冊，命之為《海外墨緣》，而流布於知友之間，求人題跋，如劉文淇之子毓崧，即其中之一，劉之〈跋〉云：

甘泉汪孟慈先生，以所得朝鮮權彝齋之札<sup>24</sup>，裝潢成冊，題曰《海外墨緣》。其議論大端，在乎發明古義，而於本朝諸儒之撰述，欽悅尤深，蓋彼中績學之士也。余考朝鮮封域，兼有高麗、新羅、百濟之故地。此三國者，在唐時夙稱文物之區，其人心企慕華風，舊史言之最悉。是故朱子奢之發題<sup>25</sup>、邢璿之講說<sup>26</sup>，此身至於其國，而為所敬者也。白居易之詩遠播<sup>27</sup>、馮定之文傳鈔<sup>28</sup>，此書行於其國，而為所羨者也。歐陽詢之字堪為範<sup>29</sup>、蕭穎士之學可為師<sup>30</sup>，此名聞於其國，而為所服者也。然則朝鮮人之虛心向善<sup>31</sup>，固

<sup>22</sup> 原註：「汪孟慈〈問經圖跋〉，載《國粹學報·撰錄》」。晉龍按：或作「十月五日」，見劉師培：《左盦題跋》，《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下冊，頁20a-20b，總頁1977。〈問經圖跋〉亦見於《左盦題跋》，《劉申叔遺書》，下冊，頁22a-22b，總頁1978。

<sup>23</sup> 原註：「汪孟慈〈致劉孟詹書〉，載《國粹學報·撰錄》」。

<sup>24</sup> 劉毓崧註：權彝齋「敦仁」。

<sup>25</sup> 劉毓崧註：「〈本傳〉云：『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遂為發《春秋左傳》題。』」

<sup>26</sup> 劉毓崧註：「〈新羅傳〉云：『乃遣左贊善大夫邢璿攝鴻臚少卿，往新羅。上謂璿曰：「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璿等至彼，大為蕃人所敬。』」

<sup>27</sup> 劉毓崧註：「〈本傳〉載元稹為〈居易集序〉云：『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sup>28</sup> 劉毓崧註：「〈本傳〉云：『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為〈黑水碑〉、〈畫鶴記〉。』」

<sup>29</sup> 劉毓崧註：「〈本傳〉云：『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為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

<sup>30</sup> 劉毓崧註：「〈本傳〉云：『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其名動華夷若此。』」

<sup>31</sup> 晉龍按：「善」又作「上」，見〔清〕劉毓崧：《通義堂文集》，《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年影印南林劉氏求恕齋刊本），第196冊，卷12，頁33a-34a，總頁428。

自昔而已然矣。況我朝稽古右文，度越前代，凡儒林之彥，藝苑之雄，並皆接跡六朝，追踪兩漢，有唐代諸公所不能及者，宜遠人之宗仰，倍甚於往時也。觀此冊者，上足以徵國家教澤之宏，次足以見學校人材之盛，下足以知藩邦歸附之誠，其可貴甚矣，豈得以尋常尺牘視之哉！<sup>32</sup>

真可謂讚賞倍至矣！

嘗有學者舉此《冊》以求江都李祖望評論。李祖望乃舉全文，分為十六則，一一加以詳細的評論與解答，時為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李著《鍥不舍齋文集》卷三，有其全文，題曰〈江孟慈先生《海外墨緣冊子》答問十六則〉，文前並有〈敍〉。其〈敍〉曰：

東國權敦仁者，字彝齋，其人溫文爾雅，有儒者風。來朝京師，與汪孟慈先生接，後以書來，先生彙裝成冊，為題「海外墨緣」四字。顧所職不可得詳，據來書稱四月膺嶺南巡察之命，五月來接藩維，去京都為七百里。聞東國衣冠爵秩，多沿唐制，巡察於唐代，職當居三品，藩維則方伯矣，故冊末葉有「承流宣化」印，相傳後總尚書事。而僻在東土，得讀中朝通儒碩彥，說經攷古之書，知識見聞，當不在山井鼎、物觀諸人下<sup>33</sup>。惟於小學、史傳、金石數事，略而弗道；所推戴，皆當時文獻，本之詩書，稽之典籍。誠以我國家聲教覃敷，不遺遐邇，如彝齋者，故亦得涵濡若此，其同文槩可知也。道光乙巳(1845)夏五月展觀，或有震其博聞彊識，指冊所言以問者，爰條對而應之。

最受到矚目者，則是權敦仁「知識見聞，當不在山井鼎、物觀諸人下」的評論。於是權敦仁就像投入揚州學術界的一塊大石，激起了軒然大波，這位傑出的海東博學之士，成為當時崇敬的對象，東國權彝齋之名，到處盛傳。

曩者經由《鍥不舍齋文集》，始知所謂《海外墨緣》之內容，頗歎服該文對乾嘉學界論析的全面性與清晰的敘述。雖然對權敦仁何以能表現出這些知識與技巧，感到懷疑，但仍然為他的表現感到高興。去年(1934)夏天，無意中得到《海外墨緣》的抄本，纔發現該《抄本》原來並非權敦仁所寫，實是金正喜本人親筆所書。

<sup>32</sup> 原註：「《通義堂文集》卷十二」。

<sup>33</sup> 李祖望註：山井鼎、物觀「皆日本國人，著《七經孟子考文》及《補遺》諸書，采錄《四庫》」。

該《抄本》寫在四十三張粗糙的小紙片上，每紙以線隔成四行，塗抹改竄之處甚多。正喜的詩稿亦常用同樣的小紙片，所以可確定該《抄本》也是正喜的親筆。該《抄本》並無問候語或收信人姓名，僅是單純的一篇論文草稿，對照今本《海外墨緣》，可見部分文字雖稍有出入，但大致而言，《海外墨緣》與修改後的稿本，文字相同者居多。而該《抄本》有許多經過塗抹的文字，但《海外墨緣》卻一個字也沒有，由此可見，《海外墨緣》的確是依據這個金正喜所寫的《抄本》而成稿。

金正喜是否受權敦仁的委託而撰寫該文；或因某種未知的理由，使得金正喜的作品，需用權敦仁的名義寄出，實際的情形如何？目前尚無法確知，但該《抄本》則可以證明《海外墨緣》確是金正喜本人的作品。若以《海外墨緣》為金正喜的作品，則信函中呈現的學人關係、知識的博通、批判的尖銳等豐富內容，始有讓人信服的理由。權敦仁雖是相當不錯的學者，但要寫出像這樣豐盛的內容，恐怕值得懷疑，也只有金正喜，纔具有如此生動描寫乾嘉學問的學識能力。

揚州學派學者以權敦仁為《海外墨緣》作者而加以稱賞，但權敦仁只不過是個中間人而已，背後的真正作者實是金正喜。此一《抄本》的出現，不但可以糾正長期以來的誤傳，同時也因而提升了金正喜的學術價值，並可補《阮堂全集》的遺漏，對阮堂的研究更提供了新的資料。本文擬將《抄本》文字分為下列十五條，每條之後指出與《海外墨緣》相出入的文字，藉以闡明兩者間的本末關係。

### 《抄本》

顧、江以來，音韻之學，夐越千古，前世無比。始以段氏十七部為論定<sup>34</sup>，更無遺蘊；及見王懷祖先生書，又見江氏書，段之十七部，尚有未定，而王先生之廿一部，又與江氏之廿一部大異。段、王之於江書，皆所深許，今當以江氏書為歸歟？江書之《唐韻再正》，曾所暫閱，如《詩韻》等書，尚未獲讀。且如王先生書，祇見其〈舉例〉一篇，但於入聲攷正段說而已，無另有著為一部全書，如顧之《五書》，江之《標準》歟？段書不存去聲，而王先生又存去聲，不止於入聲攷正而已，如有全書，可以卒業歟？江氏全書亦皆刊行歟？

### 《海外墨緣》

<sup>34</sup> 晉龍按：原文在字下以「•」作標記之文字，表示與《海外墨緣》傳本之文字有出入，今以「。」代「•」別之；下文凡藤塚 鄰原文以「•」標記者皆同。

「前世無比」之下有「矣」字。

「論定」作「定論」。

「又見江氏書」作「又見江氏晉三書」。

「段王之於江書」作「段王之與江書」。

「當以江氏書為歸歟」，無「書」、「歟」二字。

「江書之《唐韻再正》」，無「書」字。

「顧之《五書》江之《標準》」，「《五書》」作「五音」。

「不止於入聲攷正段說而已」，「入聲」下有「之」字。

### 《抄本》

天文算術，為今日急務。乾隆初，修定憲書，今已近百年，如黃白大距，已多差忒，尤合及今改測。此是中朝大人之責，在小邦，惟欽遵而已，諸公之卑近而忽之，誠未敢曉也。大概古人，似於日月交食，五星遲疾，不以測候。至如近世沈果堂，堅守此論，果堂亦非無據，如以木星之紀歲，恐為測候之一證矣<sup>35</sup>。又如火星之無定，雖西士之精於推步，尚未歸正中國之以火星為熒惑者；究其命名之義，又安知非熒惑而不可測度，仍以熒惑名星耶。此中測之更精於西，而亦測火之一證。未知為何？東人舉皆僻陋，於天文算術，尤為疎甚，如羅茗香、徐君青、沈狹侯之精深孤詣，夙所寤想，諸公所著述，俱未東來，是可歎也！

### 《海外墨緣》

「天文算術」，「術」作「學」。

「中朝大人之責」作「中朝大人之責任」。

無「諸公之卑近而忽之誠未敢曉也」十三字。

「如以木星之紀歲」作「如古之以木星紀歲」。

「恐為測侯之一證矣」，無「一」字。

「雖西士之精於進步」，「西士」作「西土」。

「仍以熒惑名星耶」，「仍」作「乃」。

<sup>35</sup> 川路祥代按：原文作「恐為測候之一證矣」，今據後文而改。晉龍按：此處當是手民之誤，蓋藤塚 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昭和 50 年〔1975〕），頁 425 同一文，僅有一「之」字。

「未知為何」，「何」作「可」。

「夙所寤想」以下，無「諸公所著述俱未東來是可歎也」十三字，而「抄本」則缺「茗香不獨算術而已又精通六書文章雅麗係是賢兄鄉親可得見其所著歎」三十字。

### 《抄本》

《尚書》之學，每以今古硬定，恐未然！孔壁之書，亦有古文，亦有今字；伏壁之書，亦有今字，亦有古文。治《尚書》者，以古文為偽，今文為真，似不精核。今日現在通行之書，非古文又非今文，即偽古文之亦非舊本，而即衛包改字之本，如段先生之書，標以古文，即統括古今之卓見也。如魏默深、柳翼南之治今文者，另有發明於《後案》、《疏證》、《撰異》等書之外者否？

### 《海外墨緣》

「孔壁之書亦有古文亦有今字」，「今字」作「今文」。

「以古文為偽今文為真」作「以古文為偽以今文為真」。

「今日現在通行之書」，無「現在」二字。

「即偽古文之亦非舊本而即衛包改字之本」作「有偽古文之亦非舊本者有衛包改字之本」。

「如段先生之書標以古文即統括古今之卓見也」作「段先生之書直標以古文有統括古今之卓見也」。

### 《抄本》

魏默深治三家《詩》，東人亦所欽聞，如《詩古微》，或有流傳者。大概默深之學，於近日漢學門戶又進一格，以西京今文之遺法，直接七十子遺言微義，亦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者也。

### 《海外墨緣》

「西京今文之遺法」，「遺法」作「學」。

「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者也」，無「也」字。

### 《抄本》

至以為十四博士家法，因鄭學而盡亡云云，立論恐太峻。如近日專門之張皋文、劉禮部兩經師，虞《易》與《公羊春秋》，寔啓絕學於數千載之後，可謂日月不刊也。雖惠氏《周易述》、《易漢學》，博取廣蒐，而至若經師家

法，恐爲後生之畏。孔氏《公羊通義》，亦爲專門，非何邵公遺法，當遜一籌於劉氏。以是推之，顧今不絕如綫之鄭學，即將因此數公亦亡矣，可乎？

說經者，立言尤慎，未知如何？如柳君書，全未得見；陳碩甫、劉寶楠、胡墨莊，亦東人之所習聞；胡竹邨、朱武曹之書，亦有流傳東國者；李申耆先生，是又弊友金秋史所嘗深慕者。其所見，爲零星文字而已，全部著述，日夕頂祝者也。

### 《海外墨緣》

「至以為十四博士家法」作「尊函以為十四博士家法」，誤矣<sup>36</sup>。

「寔啟絕學云云」，「寔」作「實」。

「可謂日月不刊也」作「可謂日月不刊者也」。

「至若經師家法」，無「若」字。

「非何邵公遺法」下有「且其非常可怪之義未免調停」十二字。

「當遜一籌於劉氏」作「恐有遜一籌於劉氏」。

「即將因此數公亦亡矣」，無「即」字。

「未知如何」，「如何」作「何如」。

「如柳君書」，無「如」字。

「弊友金秋史所深慕者」，無「金」字、「者」字。

「其所見」作「其所得見」。

「爲零星文字而已」作「不過零星文字而已」。

無「全部著述日夕頂祝者也」十字。

### 《抄本》

鄧頑伯先生篆隸，天下奉以爲圭臬，殆無異辭，東方亦或有墨搨，至於真跡，不易得。不獨篆隸，其楷艸又甚奇崛，可與金冬心、鄭板橋相上下。張皋聞兄弟，得其篆隸真髓，亦東人之所深慕。今見張氏家一門，篆勢隸法，皆不墮先緒，不勝欽誦。楊蓮卿是楊道生之近親歟？其篆勢與張氏家學，同出於鄧法，又何異也？

### 《海外墨緣》

「殆無異辭」，「辭」作「詞」。

<sup>36</sup> 川路祥代接：原文作「認」，今依後例而改。

「其楷艸」，「艸」作「草」。

「張舉聞兄弟」作「張舉文弟兄」<sup>37</sup>。

「張氏家一門」，無「家」字。

「不墜先緒」，「墜」作「隊」。

### 《抄本》

廣州《經解》，略觀其大意，存錄取舍，實有良工苦心處，不如《通志堂經解》之隨見隨有而蒐刻者。如閻之《古文尚書疏證》，是《尚書》家之華路藍縷，後來為《尚書》學者，未嘗非以此為開山第一，然寔有商量處，究不如《四書釋地》等書之更加精核，如胡朏明之《易圖明辨》亦然。其不錄此兩書，恐不必為全璧之大瑕。且《摶經集》中說經文字，當錄而不錄者亦多，此非為不錄而然，亦見良工苦心處。

### 《海外墨緣》

「實有良工苦心處」，無「良工」二字。

「隨見隨有而蒐刻者」下有「也」字。

「閻之《古文尚書疏證》」，無「尚書」二字。

「是《尚書》家之華路藍縷」，無「家」字。

「未嘗非以此為開山第一」，「非」作「不」。

「寔有商量處」，「寔」作「實」。

「《四書釋地》等書」，「等」作「成」。

「其不錄此兩書」，無「此」字。

「《摶經集》中」作「《摶經室集》中」。

### 《抄本》

至如羅茗香《春秋朔閏表》等書，或於彙刻之時，未及收到；如朱武曾、劉州倅、王進士之書，未免其後得追刻而附之下段。即或未及見於刻書之時，亦無恆也<sup>38</sup>。愚見則更輯補遺一書，雖未及刻，先舉一目例，以貽來學，且

<sup>37</sup> 晉龍按：前一條與本條均依「勘誤表」補入，見《漢學會雜誌》第4卷第2號（昭和11年〔1936〕7月），頁55。

<sup>38</sup> 川路祥代按：原文作「恢」，今據後文而改。晉龍按：此處當是手民之誤，藤塚 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頁427同一文，實作「恆」。

及於遠邦，俾廣見聞。另有心心祝祝，幸亟圖之。春秋朔閏，前人之考辨，不勝指摟。即此羅說，必有益加發明者，在此等處，後出者，更爲精好矣。

### 《海外墨緣》

「未及收到」，無「收」字。

「即或未及見於刻書之時」作「茗香之書未及見」。

「亦無恠也」作「亦或無怪」<sup>39</sup>。

「愚見則」，無「則」字。

「雖未及刻」作「雖未及即刻」。

「見聞」作「聞見」。

「心心祝祝」作「心祝心祝」。

「春秋朔閏」下有「表」字，誤矣。

「不勝指摟」，「摟」作「按」，誤矣。

「即此羅說」作「今者羅說」。

「在此等處」作「此在尊處」，誤矣。

### 《抄本》

近如顧棟高《大事表》之《朔閏》一書，亦頗核；又如姚尚書文田所著《朔閏表》，皆有可觀，《經解》中，無一收存，此亦有微意之可見。近來言天文算學者，殆無不於春秋朔閏致力焉，然此寔有慎言闕疑者，恐無以鑿鑿推步，如今日「時憲術」也。

### 《海外墨緣》

「無一收存」作「無一存者」。

「寔」作「實」。

### 《抄本》

雖以今日「時憲法」言之，《考成後篇》，已與《前編》大異。《前編》則以地心爲靜體<sup>40</sup>，《後編》則戴之立法，以太陽爲靜體之新術，而藏頭截尾，只從橢圓一說發明之，若使後人看之，必有不詳於本面之慮。今之《顚頊歷》、《魯歷》等書，設有全書，實難其歷<sup>マ</sup>遠溯五千年以前之日至也。

<sup>39</sup> 晉龍按：「恠也」二字未有旁點，依例當有，故補之。

<sup>40</sup> 晉龍按：此句之前還有「非徒大異而已」一句六字。

今欲盡究其說，無以一一更僕，無所主定之淺見，敢此呈露於君子之前，亦不敢自阻耳！

### 《海外墨緣》

「以太陽為靜體之新術」作「以太陽為靜體體之新術」，衍一「體」字。

「只從橢圓一說發明之」，「說」作「術」。

「必有不詳於本面之慮」下有「矣」。

「《顓頊歷》《魯歷》」，「歷」字皆作「厤」。

「厤マ」作「厤之」，「之」字誤。

「無以一一更僕」下有「以若」二字。

「敢此呈露於君子之前」作「敢以前露於君子之前」，誤矣。

### 《抄本》

翁先生與凌中子論文，斷至六朝者，是凌說，非翁先生之義也，翁先生不主駢儼。凌說之以《文選》為古文正宗者，似大駭於俗見，亦不為無據。蓋《選》理非才力兼至，無以下手，非謂近日抽對黃白、釘餽古今、妖冶綺麗，雖然並陳也。韓文公所云：「惟古于詞必已出」者，是真《選》理，空疏淺近，何以措一字於其間耶？今乃反是，《選》體殆家家抱玉，人人懷珠。至於唐宋八家之法，作者甚鮮，方望溪、姚惜抱、朱梅崖、張皋文、惲子居若干人外，並非正脈，何其甚難<sup>マ</sup>於《選》家歟！芸臺先生所云：「昌黎是矯《文選》之遺弊者。」是堂堂卓見正論，與凌說有表裡相合。又其考證文筆等說，無非脩明古學之一段奧義妙旨，此凌說之不為無據也。以為如何？

### 《海外墨緣》

「與凌中子論文」作「與凌仲子說文」。

「斷至六朝者」，「至」作「自」。

「抽對黃白」作「抽黃對白」。

「釘餽古今」作「餽釘古今」。

「朱梅崖」作「朱梅崖」。

「何其甚難<sup>マ</sup>於《選》家歟」作「何其竟難<sup>マ</sup>作《選》家歟」。

「卓見正論」作「正論卓見」。

「與凌說有表裡相合」下有「者」字。

「其考證文筆等說」，「等」作「諸」。

「以為如何」作「以為何如」。

### 《抄本》

校讐之學，已爲斷航絕港，鄭漁仲《通志》諸〈略〉中，特著〈校讐〉之一門，是另具隻眼者。元明以來，未聞此學，近日如錢竹汀、王禮堂，皆其選也。盧學士、王高郵之書，亦有東來，至於《十三經校勘記》，是又集大成也。今欲讀經，舍此何以哉？陳太史壽祺曾以《校勘記》及段氏《漢讀考》中數三段，反覆商論，與翁先生，抵書相難，頗欠厚風。陳亦爲師門明其是非，辭語之間，似不得裁抑矣。今以二三條，設有未盡，未可爲全璧之累。康成大儒，駁正許氏《五經異義》，而無少毫損於許氏耳！

### 《海外墨緣》

「鄭漁仲《通志》諸〈略〉中」，無「中」字。

「〈校讐〉之一門」，無「之」字。

「《十三經校勘記》」，「校」字作「校」。

「曾以《校勘記》及段氏《漢讀考》中數三段」作「曾以《校勘記》及段氏《漢讀考》數事」。

「辭語之間」作「詞語間」。

「今以二三條」作「今以一二條」。

「無少毫損於許氏耳」作「無少毫損益許氏耶」。

### 《抄本》

書法之分爲南北兩派，亦不可誣也。此是南北之各尊一師，互相門戶而已，若叩之鍾、王，便各一笑者也。唐太宗是南派，遂以右軍爲宗；北派雖不振，然歐、褚之自北派來者，源流甚明；虞則南派，與唐宗相同矣。歐、褚之浸淫於右軍法門，即如孔穎達之於經學，未盡南學而爲時勢所屈也。至以右軍爲無篆隸遺，則大不可，禊帖之「永」字、「趣」字，有篆勢、隸勢之確證者耳。

### 《海外墨緣》

「書法之分爲南北兩派」，「爲」作「於」。

「亦不可誣也」，無「亦」字。

「若叩之鍾王便各一笑者也」，「叩」作「扣」，「便」作「更」。

「與唐宗相同矣」，無「相」字。

「即如孔穎達之於經學」，無「即」字。

「無篆隸遺」下有「法」字。

「有篆勢隸勢之確證者耳」，無「勢」字。此句下有「前寄禊帖二本出自舊刻況又儒林遺澤所及奉如球璧為萩林傳世寶玩受貺尤大矣」三十四字。恐係權彝齋所加之文。

### 《抄本》

張亨甫論詩，是說詩極軌，以此益知亨甫詩，大有本原，尤所欽誦。《婁光詩藁》，更增幾卷耶？尚在京耶？每見其嶮崎歷落，奇氣千丈，有不掩於詠歎之際，何不少令含畜，藏器待時耶？士之不遇，自昔伊然，坎止流行，隨處皆亨，為此公所望甚厚，如是貢愚耳。

### 《海外墨緣》

「大有本原」作「大有原本」，誤矣。

「《婁光詩藁》」，「藁」字作「稿」。

「尚在京師耶」作「尚在京時」，恐係權彝齋所改。

「如是貢愚耳」下尚有「弟與此公一番相遇未獲投契緣慳之歎久不自已」二十字，《抄本》原缺，恐係權彝齋所加。

### 《抄本》

石研齋藏之燬於火<sup>41</sup>，又一書家大厄，宋槩善本，有影翻刊行者，此則流傳世間者似不少矣。玉笙近在何處？弊友有與玉笙親好者，夤緣聞之熟耳。

《擘經堂集》暨《經說》一則，奉以為金科玉條，得此一語，尤是讀經之津筏。非賢兄苦心，何以賤名達之「文選樓」中，有是隆貺，頂戴ママ，不知攸謝！《尚友記》補成，日以望之。汪雙池、江慎修、朱止泉、王白田之於朱門，大有功，亦東人之所知。王白田尤是闡發朱學之至者，雖當日黃、楊諸門弟，恐未必如此。白田《艸堂集》雖零甚，淺見當在《三魚集》上也。潘司馬《文苑》、《循吏傳》如已刊，何不以一本遠寄？心禱ママ！

《抄本》到此為止。

### 《海外墨緣》

<sup>41</sup> 晉龍按：《海外墨緣》此句作「石研齋藏書之燬於火」，多一「書」字，似較為明晰。

「有影翻刊行者」一句上有「頗」字。

「似不少矣」，「似」字作「為」。

「《擎經堂堂集》」作「《擎經室集》」，是也。

「金科玉條」，「條」字作「律」。

「《尚友記》」作「《尚友錄》」，誤矣。

無「汪雙池江慎修云云」等九十字，恐係權彝齋所刪去。

### 《海外墨緣》

印刻在六書之一，上自商周鐘鼎，以及秦璽漢印，亦如經師家法，不可自我作古。前代之程穆倩、何雪漁，可與漢印周寶。如王麓臺、沈謙齋，遺跡尚有存者否？董小池、陳曼生，皆賢兄知好，諸印皆其所刻歟？亦有「印譜」之彙成者否？弟於此印癖，老而愈甚，有是仰叩，願沾餘濡耳。汪訥庵多藏印，文何古？印亦有搨成一譜者否？訥庵是賢兄族親耶？伊小沂印刻，亦入兩漢室，可與張彥聞上下，今聞遠宦，無緣湊接矣。略陳鄙抱，敢希剖正，公事忿忿，無以罄悉，諸惟鑑照，不宣。弟權敦仁頓首戊戌（1838）八月二十日。

上述《抄本》所缺的文句，恐係權彝齋所加入。

以上列舉了《抄本》與《海外墨緣》的差異，攷其所以產生差異的原因，約可歸納為四點：

- 一、權敦仁曾對金正喜的《抄本》加以修正。
- 二、權敦仁附入了自作的文句。
- 三、權敦仁所寫的草體文字，有朝鮮人獨特的習慣寫法，清人因而誤讀誤記之。
- 四、刻字者本身的錯誤。

信函中有「李申耆先生是又弊友金秋史所嘗深慕者」，這是金正喜從權敦仁的角度，客觀的來敘述自己。李祖望可能也聽說過金正喜相關的事蹟，故在《海外墨緣冊子》後，還特別寫了一段說明的〈附記〉云：

秋史者，姓金，爲東國殿撰，性嗜書，亦極博雅。聞其扁署曰：「阮堂」，蓋景慕儀徵相國而名之也。與孔子顓軒仰企康成，顏其堂曰「儀鄭」者略同。<sup>42</sup>

<sup>42</sup> 晉龍按：此段〈附記〉見〔清〕李祖望：《鍥不舍齋文集》（李氏半畝園刊本），卷3，頁16a。「孔子顓軒」，當作「孔氏顓軒」。

李祖望卻不知此〈附記〉所說的秋史，正是《海外墨緣》的實際作者。

統觀這些信函的內容，探討了有關音韻學、天文算術、《尚書》古今文、三家《詩》、古文正宗論、校讐之學、南北書派論等各種的問題；表達了作者有關《皇清經解》、《古文尚書疏證》、《四書釋地》、《易圖明辨》、《摯經室集》、《春秋朔閏表》、《春秋大事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周禮漢讀考》、《婁光詩稿》、《尚友記》等書籍的見解；惋惜秦恩復石研齋藏書的災厄；評驚了顧炎武、江永、閻若璩、胡渭、顧棟高、惠棟、沈彤及錢大昕、王鳴盛、盧文弨、王念孫、王引之、翁方綱、凌廷堪、阮元、段玉裁、江有誥、姚文田、陳壽祺、汪紱、朱澤灝、王懋竑、方苞、姚鼐、張惠言、朱仕琇、惲敬等諸家名儒的著作，宣揚他們長處者多，持批評態度者恆少。也提到朱彬、李兆洛、鄧石如、金農、鄭燮等人，甚至還提及羅士琳、徐有壬、沈狹侯、劉逢祿、魏源、柳榮宗、劉寶楠、胡承珙、胡培翬、張際亮、楊松等新進學人，可見其從多元角度觀察諸名家的態度。金正喜因為曾在北京師事過翁方綱與阮元，所以文中特別稱為「翁先生」、「芸臺先生」，以表達其敬意。金正喜在私人關係上，與翁方綱、阮元和凌廷堪等三人相當熟識，透過他們三人來討論古文正宗的相關問題，特別令人感到有趣。金正喜亦給予《皇清經解》「良工苦心處」的評語，其實早在道光十一年(1831)歲末，阮常生所遠贈的《經解》，就已成為他珍藏把玩的對象了。金正喜可能是閱讀到《左海文集》卷四所錄的〈答翁覃溪學士書〉一文，因此纔批評陳壽祺對翁方綱的態度有失厚道；但也可能是金正喜懷疑因為陳壽祺的關說影響，使得在《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中，全未採錄他所尊崇的翁方綱之經說的緣故。另外金正喜也讚嘆鄧石如的篆隸，蓋金正喜之父魯敬，於道光二年(1822)冬在北京時，結交了鄧石如之子尚璽<sup>43</sup>，尚璽非常尊崇魯敬，特別請求魯敬為其父石如撰寫墓誌銘，並將其父手書的篆隸寄贈給魯敬，正喜因得以先觀賞之。筆者的「望漢廬」中，即收藏有尚璽寄給魯敬的信函，石如的玄孫鄧叔孫君，亦珍藏數封魯敬寄給尚璽的函件。尚璽受到父執世交李兆洛的照顧而長大成人，金正喜因此也聽過李兆洛的大名，且甚欽佩其所為。李兆洛與鄧尚璽的親友中，還包括有張氏一族，主要是張惠言與其弟張琦，張琦之子曰：曜孫；又有三女曰：孟緹、緯青、婉絢。張琦與曜孫皆善篆隸，尤其是三女婉絢，從父學北碑而上之，其作神彩駿發、端莊遒麗。金正喜與張琦父子亦是

<sup>43</sup> 原註：鄧石如之子尚璽「字守之」。

神交，故珍藏了汪喜孫所贈張琦的書法和婉紈的篆隸，對他們的作品更是激賞不已。張惠言之侄曜孫，也贈其惠言的《箋易注元室遺稿》，透過張氏的贈書，使得正喜首次有機會接觸到《虞氏易》。其後曜孫與正喜弟子李尚迪，交情更為深厚，往來的信札，其數多達幾十封，由此可見兩者交往的密切。

《尚友記》是汪喜孫在道光十七年(1837)正月廿四日，寫給金正喜的一封信中親自附贈。《尚友記》寫在每半葉十一行的大型格紙上，由許多不同的筆跡寫成。卷首有汪喜孫的親筆云：

儀徵相國，涇潘副憲，前後譏《儒林》、《文苑》、《循吏》三傳。喜孫謹據所見，成《尚友記》，將上之史館以備采擇<sup>44</sup>，并藏之焦山海西庵書藏。  
道光十五年(1835)正月廿五日甘泉汪喜孫記。

在其背面又親筆錄下劉逢祿的〈題詞〉云：

劉禮部題詞。

大著《儒林傳彙》，校讀一過，實昭代不刊盛典，再讀一過奉繳。他日再將〈循吏〉、〈文苑〉及〈逸民〉、〈忠義〉、〈名臣〉諸傳，裒輯一書。自當直接馬、班，陳壽、歐陽而下，其自鄙矣。武進劉逢祿跋。

該書裝訂成二冊，金正喜在兩冊封面的後頁，按照順序親筆錄下從陳寔至鄭元慶等共五十九人的姓氏、名號、官職；並鈐有「汪喜孫印」、「金正喜印」、「孟慈」、「秋史」等四種印章。此書諸家藏書錄均未見收載，近日出版的《邃雅齋叢書》中，收有北平倫哲如的藏本，唯該本僅存鄭虎文至馮廷丞等十五名而已。此本係編者親自贈給金正喜的完本，中土不傳之書，因此完整的保存在朝鮮，實在是學界值得慶幸的一件大事，而該書現正收藏在筆者的「望漢廬」中。

由於汪喜孫不偏漢學，對宋學也非常重視的關係，因此金正喜最後列舉了汪紱、江永、朱澤澐、王懋竑等朱學的學者。金正喜認為王懋竑不亞於朱門的黃、楊，王著《白田艸堂集》的價值，當在陸隴其的《三魚堂集》之上，此亦可見金正喜平生為學，不輕忽宋學的治學態度。

以上已將信函中呈現的幾項重點，作了簡要的說明。當汪喜孫閱讀了權敦仁具名的這封信函後，必然相信這是權敦仁的手筆，因此特意裝訂成冊，使其在知友之間，往復流傳，讓他們知道海東也有此等博學者。由於《尚友記》寄出後，久未見

<sup>44</sup> 晉龍按：「史館」前原空一格，藤塚氏以為缺字，實則此與「提行」之意相同，非缺字也。

金正喜的回音，汪喜孫在驚訝之餘，就在兩年後的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十日，寄了一封長信給金正喜，喜孫除詳細報告自己和學界的近況外，還表達了久久未接到金正喜詩文信函的遺憾之意云：

吾輩文字之知，若以不見面而遂疏，不在京而有間，非古謹也，執事思之！

吾輩生已五十有四，所居二千里外，相知有素，相見無期，若併此詩文，不能得之於知己，一不在京，遂不通問，豈非劉孝標之所嘆邪？<sup>45</sup>

喜孫焉知海東之地，暗雲低迷，正喜在接到這封信的第二年，父子慘遭厄運，以五十五歲之高齡，被貶謫到耽羅孤島上。當此一悲慘的消息，不久之後傳到北京時，汪喜孫的驚駭與意外，可想而知。汪、金兩人是同庚，都出生於乾隆五十一年<sup>46</sup>，道光二十七年（1847），就是悲劇發生後的第七年，六十二歲的汪喜孫，因積勞而病逝於懷慶府的任所內。同為六十二歲的金正喜，則依然謫居在耽羅島上，當他收到汪喜孫的訃聞時，又不知要如何哀痛了？

如果將汪喜孫及其周圍的許多學者，例如：吳嵩梁、葉志詵、李璋煜、劉喜海、陳慶鏞、阮常生、阮福、葉紹本、黃爵滋、曹懋堅、張際亮等人，與金正喜、權敦仁學術交往的實況，予以分析討論，其實也就可以詳細的描繪出清、鮮文化交流的情況，不過在這篇小文中，並沒有意圖要處理這個問題。

〔附記〕本稿原與拙稿〈金秋史入燕與翁、阮二經師〉同時起草<sup>47</sup>，本意即欲兩文互為補充，故此文略去金正喜經歷的敘述。

<sup>45</sup> 原註：「家藏原信」。

<sup>46</sup> 原註：乾隆五十一年「丙午」。

<sup>47</sup> 原註：〈金秋史入燕與翁、阮二經師〉「刊於《東方文化史叢考》」。晉龍按：〈金秋史の入燕と翁、阮二經師——清朝文化東漸の一斷面——〉一文，見京城帝國大學文學會論纂：《東方文化史叢考》第1號（漢城：京城帝國大學文學會，昭和10年〔1935〕3月），頁255-362。